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一五五期（总第 405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13 年 10 月 30 日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3905103528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在此期间，中央委员会将召开若干次重要会议（全会），就重大政策决议进行讨论和投票。其中，一些全会主要关于思想建设及宣传领域，而三中全会通常聚焦于经济。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今年 11 月举行。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这次会议将制定出中国下一轮经济改革的整体规划，社会各界翘首以待，期望改革顶层设计对若干宏观经济问题能有重大突破。

三中全会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改革力度之大将前所未见，其中包括金融自由化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税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

今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被赋予重大历史意义。在 1978 年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走上了市场化改革道路。而 1993 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则奠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做出了令数以百万计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艰难决定。

境外媒体分析指出，即将召开的全会是可以看清楚中国新济政策全貌的最佳时机，而在此之前，中国领导人已经向外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由于全会的关键在于给出清晰的改革的基本原则，以指导随后的政策细节并为其提供全方位理论支持，所以全会的关键词备受期待。

本期推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专题，供各位领导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相信也会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要目

●本期专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

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药方猜想：七个领域将推新政策

●八面来风

李克强：中小企业代表生产力方向

●高屋建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直言中国房地产泡沫严重

●历史深处

杨天石：蒋经国“打虎”为何失败

●悦读时光

《习仲勋传》（下卷）节选：

习近平坚信父亲是一个大英雄

●本期专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

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药方猜想：七个领域将推新政策

凤凰财经综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在7月中旬实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举措标志着国内经济转型计划向前迈出重要一步。这或许也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最后一次轻松推进改革，因为新领导集体的改革计划可能会遭遇反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都主张让市场机制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而且经济学家认为政府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不再行之有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暗示打算将经济增长重心转向内需。

7月19日，中国决定取消政府规定的银行贷款利率下限，以推进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不过，政府关于进一步改革的提案将面临艰巨的审议过程。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政府的改革提案可能会遭“瘦身”，甚至完全不被提上议程。此次会议力争达成一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方案。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的说法，在今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以支持市场化机制闻名的改革家刘鹤将领导负责起草具体经济改革方案的工作小组。

李成称，刘鹤拥有非常丰富的经历，他从事财政工作 15 至 20 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经济技术官员。但关键还要看刘鹤的技术才能能否消除改革方案在党内面临的阻力。

预计领导人将结束在中国延续了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以来，在人为营造的低利率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依赖大规模的工业和基建投资，期间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但享受不到城镇户口的相关福利。

曾担任过政府顾问的经济学家黄益平表示，在高层官员的指示下，工作小组目前正力图拿出一套方案，以在秋季提交。

黄益平称，工作小组考虑的改革方案包括：取消对土地所有权和城镇户口的限制，调整税收体系以便为资金紧张的地方政府提供更多资源，同时放松对能源价格的控制。此外，放开金融机构存款利率管制、放松对资本跨境流动的限制等金融改革议题也是工作小组重点考虑的问题。

不过，许多潜在改革方案将对国有部门不利。国有银行将被迫高息揽储；地方政府可能不得不为日益扩大的城市人口支付额外的社保费用，而且还不清楚新的税收方案是否足以弥补相关的资金缺口。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姚阳表示，大家对财政改革寄予厚望，但他本人对于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表示怀疑。他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很难平衡。

在中国政府的改革方案中，最核心的就是城镇化。李克强认为，城镇化可以带动经济增长，并刺激私营领域的消费。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属、负责起草城镇化方案的规划小组拿出的方案被其他部委和政府部门泼了冷水，这只是城镇化阻力的一个缩影。

目前中国已有 2.6 亿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如果让他们享受和城镇居民同样的福利，那么从住房到教育的所有资源都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已然超负的地方政府还将承受更大的财政压力。

由于地方政府向中央游说，而且户籍制度改革也牵动城镇中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改革计划可能最终被大打折扣。

中国商务部下属智囊机构的负责人霍建国表示，争论仍然存在，例如我们是不是真要改

革，以及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根据迄今为止发布的少量城镇化方案的细节，改革将从中小城市开始——而大城市数百万农民工的命运仍然不得而知。

前世行国局局长黄育川表示，总体而言决策者还是倾向于推进中小城市的户籍问题，但这种策略是有缺陷的。他说，在小城市上城镇户口现在已经很容易了，劳动力流动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更多的是在大中城市。

考虑到高层将城镇化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因此最终出炉的方案可能会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有更为大胆的动作。

发改委经济学家张燕生表示，重大改革方案往往要两到三年才能完成，过程总是很漫长。张燕生没有直接参与城镇化方案起草工作。

中国政府考虑推出新政策的领域：

金融自由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提高家庭储蓄回报，以及放松跨境资本流动管制。

让地方政府来负担大部分社会性支出，同时赋予地方政府新的征税权，以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和举债的依赖。

给予农民更大的土地经营自主权，尽管农民的土地从形式上仍为国家所有。

取消政府对能源价格的管制，这对于中国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至关重要，但汽油和电力价格的上涨将难以被消费者所接受。

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李克强总理已承诺在任期内将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据世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 1981 年的 0.29 升至 2009 年的 0.42。基尼系数是衡量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平均。

改革户籍制度，让进城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

国研中心此份报告仅是供三中全会参考的众多报告之一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公开了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下称“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近一个月后，市场突然以改革“路线图”之名对其进行轮番解读。

资料显示，该报告由国研中心主任李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担纲领衔。近期有媒体报道称刘鹤为三中全会经济改革方案的规划者，市场因此揣测国研中心的报告有可能与三中全会报告大面积重合。

昨日，一名政府高层智囊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报告基本以国研中心的自主研究为主，属于提供给中央参考的众多咨询报告之一。市场对本次全会的期望较高可以理解，但不应因为国研中心的官方智库背景和该报告系统性的经济政策而做过多猜测。

他还透露，该报告大约是在今年年初开始启动，课题组集结了中心大量资深专家。彼时刘鹤还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作为整个中心的大型课题，刘鹤挂名符合规律，因此也不能将该方案解读成为某个单独个人的意志。

“383”报告如何出炉

近期，包括官媒在内的多家媒体都报道了国研中心发布为三中全会提交的报告的消息。记者了解到，该报告早在10月1日出版的《中国改革》杂志上就已全文刊登。而为何近两日突然走红，业内人士对本报分析称，除国研中心的官方背景外，作为该报告领衔人之一的刘鹤近期被“曝光”为三中全会经济方案的主要起草者，是该报告再次升温的一大原因。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报告？《中国改革》杂志文章最后落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研究报告”，前述智囊人士认为，这一落款基本上是准确的。

他称，随着三中全会的临近，今年陆续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报告出炉。一部分将通过各种渠道提供给中央参考，一部分则作为学术成果在社会上交流讨论。“‘383’因其官方智库背景，因其在经济方面较系统，（所以）更受关注，但终归是众多报告之一。”他称，同样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国研中心为国家重大决策建言献策更是分内之事。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认为，由于课题牵头人身份特殊，竟引来市场众多遐想。一方面说明市场渴望，对改革有很强期待；另一方面说明市场浮躁，对中国政情不了解。固然，文中有些建议反映了人们某些期待，但了解中国政情的人，都很清楚，它只不过是研究报告。

根据已经公开的内容，所谓“383”方案，是指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报告认为，“三位一体”改革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此必须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垄断行业、土地制度、金融体系、财税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体制以及对外开放等八个重点领域的改革。

该报告引发广泛关注的原因，还在于其“尺度很大”，许多诸如涉及行政审批制度、反腐倡廉制度、土地制度、财税体制改革等内容，均是目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其提出的政策建议也更直观和大胆。“获得广泛关注说明这个报告还是比较接地气的，至少是大家关心的内容，这也起到了传递声音的作用。”上述智囊人士评论说。

此外，报告还给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建议将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即2013年~2014年的

近期改革、2015年~2017年的中期改革和2018年~2020年的远期改革。这对于亟盼改革的市场而言，也是一剂强心针。

市场热盼“改革全会”

上述智囊人士称，将一个机构的研究报告看作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也是片面的误解。但应当承认的是，这也反映出市场对改革翘首以盼的心情。事实上，近期国家领导人的频繁表态，都显示出三中全会的全局性和非同一般的意义。

国家主席习近平 23 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时表示，大家都很关注中国改革进程，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创新活力。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 26 日上午在第九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幕式上指出，下个月将召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主要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这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必将强有力地推动大陆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上述人士认为，当前现实情况使得此次三中全会的改革备受市场期待，而俞正声所说的“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也传达了中央改革的决心。

“这个改革的路线图，是不是制定得好，能不能够圆满地执行，就决定了经济增长转型到底转得过来，还是转不过来。”经济学家吴敬琏此前在北京出席一活动时说。

“全民建言”时代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官方智库机构的研究成果对即将出台的政策会有重大影响，甚至会有大面积重合。也正是因为国研中心的官方背景，“383”才会引来如此多的关注。

前述智囊人士称，经过多年的执政探索，中国式决策正在不断变得科学化和民主化。

他介绍，一般来说，大决策会同时向多部门征求研究咨询意见。而真正的起草过程，会反复权衡，反复征求意见。“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机构的研究成果上报中央已不是什么独家特权。”他称，现在是一个“全民建言”的时代，成果上报渠道的多元化和官方逐渐开明的态度注定某一家机构的研究成果不可能完全成为政策本身。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概念源于西方“thinktank（思想库）”一词，侧重于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组织。这种智库在中国出现在上世纪 90 年代，在科技“下海”的浪潮下，一批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开始组建智库，如林毅夫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樊纲的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

目前，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务院参事室被视为中国政府最核心的智囊团，中共中央政策研

究室和中央党校一直是中国执政党的理论智库。此外，各部委也有各自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这些智库因直接参与各部门的政策研究和制定，针对性更强。

还有一类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以中国社科院、国研中心和国家行政学院为代表。

记者从多名知情人士处了解到，官方和半官方智库多以报告和内参的方式建言献策，比如国研中心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调研，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参与“五年计划”的起草，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参与党代会报告的起草。

近年，一些拥有丰富经验的退休官员和资深学者纷纷创办和加入到多种形式的非官方智库机构中。他们利用各自的渠道，也将一些研究成果上传到中央或相关部门负责人手中，丰富了有关部门的参考素材。

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包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在今年都曾向高层递交研究成果。（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学者前瞻十八届三中全会：1978 年后又一次“国退民进”

凤凰财经综合香港商报刊登经济日报副社长兼研究部主管石镜泉的评论文章，这篇题为《国企须向民企让路》的文章中表示，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十八大三中全会的议决的启示可以概括为：国退民进。文章表示，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国退民进”，到之后走回头路，多了“国进民退”。新一轮政府改革，又会再倡“国退民进”。

以下是其文章全文：

这几天都在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对十八大三中全会的议决有启示，如果你看不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八股的话，只用记住一句：国退民进。

只有国退民进行得彻底，才可以有市场经济，才可以促内需，才可以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生产力提升，才可以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只不过，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国退民进中，有部分当权者走回头路，回到国进民退，因为中国今时仍是有权便是有一切；怎办？

理论上，国企是国家的，赚了都应是归全体人民，也是民。如果所有国企人员都有雷锋精神，则国进还是退都不重要，可惜具雷锋精神的国企不多，但具吃喝玩乐，中饱私囊的国企人员就不少。因此，要真正达成国退民进，重点是让国企成为清水衙门或咬不入的青沙梨。

习李王将整顿国企

前日中纪委的王岐山就明言，中铁建招待费逾 8 亿元，其监管人要为之背书，这即是谓要有人负责，如有失职，会被追究，以防大家“围威卫”，用公款我益你，你益我。不是贪污，但实情又与贪污何异？有这样问题的国企，当然不止中铁建一家，昨日金融街[-0.58%资金研报]网站就公布了近 20 家国企有这问题。习李王是希望把这个可辩驳为不是贪污（也因此不能入刑罪）的大花筒，也要负上管治之责，目的一个，削藩先削其收益。既得利益团体怎会不顶住？结果有两个，一、在有齐削利益这个共识后，才举行十八大三中全会；二、习李王让步，先不削利益。

如果从这角度看问题，则应预期，在十八大三中全会前后，不要指望国企会有大升幅，要投资，都先找民企好一点。

在 1978 年开放改革初期，中央不能不以国企，或下海的国企人才去做排头兵，去发展民间经济体，故当时的口号是：发展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但最终究竟是要以“社”还是“资”为主？

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应该指出，所以形成这种落后状况，责任首先在于中央和各级党委对于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方法不对，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大家作自我批评。

要解放思想、要减少禁区，似乎是“资”要多一点，这是指手段上言，但如是以权谋私，就无论是“社”是“资”，都不允许的。

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国退民进”，到之后走回头路，多了“国进民退”。到习李王时代，又会再倡“国退民进”，但这次就应有点不同。1978 年是由国企主导退，协助民进，是在无市场经济下，制造出个市场经济来，这个制造出来的市场可以是不符实际的。但今时市场经济好歹都有了 30 年，未必再要由中央、国企出来指指点点，故在十八大三中全会中，可能会强调：以市场作主导，中央会促进，国企要配合。也就是所谓如果市场要食了一些国企份额的，国企也要让吃掉，这不是瞎猜，人行开设利率市场化，民资可以办银行、建铁路，三马可以搞网上保险，都是国企要面对被「食」的命运。

是否所有国企都会被食？不是，要看其性质，国企按其服务性质可分为四类：

- (1) 提供社会保障职能：如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被食硬；
- (2) 提供非盈利性公共服务职能：如基础建设、城轨、公共运输等，要让仁者来食；
- (3) 战略性产业：如能源、通讯、金融、交通，只会有限度地被信得过者食；

(4) 保障国家安全职能者：基于国防安全理由，民企唔使谗会有得食。

名词解释：国进民退

经济学语汇，一般用于表示某领域国有资产进入而民营资本被迫撤出。“国进民退”，是从 2002 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中一个被频频提及的现象。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随着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出台，它在瞬间被放大，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

收入分配改革有望三中全会后推进提低或率先突破

收入分配改革或从初次分配“提低”突破

中国证券报记者丁冰近日从权威人士处获悉，把初次分配放在重要位置、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将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突破点，有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出台相关措施。

今年初发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下简称“《意见》”)提出：“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 5 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目前，财政部正抓紧落实上述要求。

“提低”或率先突破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主线是“提低、扩中、控高”。目前“提低”可能推进更快一些，这方面共识更多，阻力较小。如能在“提低”方面有新进展，对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逐步缩小收入和财富的不合理差距，将发挥很大作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目前决策层在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方面的改革已有框架。初次分配要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缩小地区、行业、个人之间差距。

对“提低”具体方案，专家认为，首先，需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城乡居民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各项标准的提高。其次，应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待遇，争取对现行养老金“双轨制”有所突破。另外，应合理适时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及社会低保标准，建立并逐步健全劳动密集型行业低收入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继续抓好农民增收工作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前首次公开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业内人士表示，报告提出，设立“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这正是着眼于城乡居民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完善。

苏海南说，目前初次分配领域的分配起点、分配过程不公平问题很多，导致分配结果很不合理，这使二次分配调节初次分配结果的压力很大。由于我国现在还没有建立起全面的居

民收入信息系统，政府对初次分配结果的真实情况难以搞清楚，在此基础上，二次分配只能调节初次分配的部分结果，更调节不了初次分配的起点、过程的不公平。当务之急是在初次分配中进一步健全分配规则，抓好落实，以保证初次分配的起点公平，分配过程逐步规范，从而使分配结果相对趋向合理。二次分配则通过健全制度加大对初次分配结果不合理部分的调节力度。

改革财税制度

《意见》为收入分配改革制定了原则性要求和政策。专家建议，应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制定收入分配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

苏海南表示，为推动《意见》落实，下一步应抓紧推动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是收入分配体制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改革对于整个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意义重大。这方面不改，收入分配体制的很多方面改不了、改不到位。

业内人士认为，提高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及其他社保支出的占比，是有效缓解低收入阶层生存困境，缩小贫富差距有效手段。

要提高民生支出在财政总支出的占比，首先要在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功能的同时，引入社会资本，降低政府投资在财政预算中的比重。其次，适度下调政府行政管理开支的占比，通过优化组织结构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减少“三公费用”支出，降低公共服务成本。

由此可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要深入推进，必须同财税制度改革相配合。苏海南建议，从“少征”方面看，既要抓好已有结构性减税政策落实，还要研究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政策，切实减轻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税费负担，促进这些企业调整产业产品结构、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素质，使之能在生存发展、兼顾劳资利益前提下，有能力提高员工工资。

从“多征”方面看，财政部门正研究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直接纳入公共预算，以保证国企税后利润及其它收益能够提取相当部分用于社会保障和其他民生支出。

在个税改进方面，苏海南表示，应研究协调工薪所得税率和资本所得税率间的平衡。下一步改革要研究使工薪收入和资本所得的个税税率水平相当。

在财政预算体系方面，他认为，要研究财政预算体制与编制体制联动改革，严格控制行政经费(含“三公”开支)，公开透明制度化，财政一般性预算与建设性预算相分离；建立制度化的公共服务型预算。

在财政支出领域，要努力协调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促进实现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匹配；在省管县的层面上，各省应做好省内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促进省以下各县之间财政资金均衡。应进一步强化对再分配的监督，要使人大代表看得懂财政收支预决算方案，充

分发挥其监督作用，特别是对三公经费的监督。

遗产税推出时机尚不成熟

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近日关于开征遗产税的争论不断。业内专家表示，遗产税作为对个人所得税的有益补充，不仅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避免社会阶层固化、鼓励后代勤劳致富，而且对完善财产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颇有助益。从长远看，开征遗产税是有必要的。

但需要看到，促进收入公平分配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在产业结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市场环境等方面多管齐下，遗产税开征并不能一举扭转失衡的利益格局和失范的收入分配秩序。

“目前遗产税开征暂不具备现实条件。”苏海南表示，《意见》提出，“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这一提法是很客观的。我国居民家庭财产很不透明，难以认定并征税。现在能做的一是强化对高收入家庭和个人征收个人所得税，二是研究尽快建立居民收入和财产信息征集制度，在此基础上再研究今后如何开征遗产税。

港媒：三中全会后楼市调控或采取釜底抽薪之法

凤凰财经综合据香港《经济日报》今日报道，文章指出，内地楼市近月再次炽热，中央看似按兵不动。新领导层强调改革着眼于“顶层设计”，估计三中全会后，楼市调控措施会采釜底抽薪之法，改革集中在土地、税收及体制方面。

中国指数研究院近日公布数据显示，9月国内百城新建住宅均价连续16个月环比上升，同比升幅亦较上月扩大。在国庆长假期间，部分大城市楼市成交炽热，有形容指现今楼市再次进入“疯涨”阶段。

发展商各师各法提高楼价

虽然一线城市楼价被中央紧盯，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发展商仍是花样百出以提高售价，以北京为例，一些新盘就通过收取精装费来提高售价。业内人士表示，以清水房捆绑精致装修价格的做法正在大行其道，精装费最高者收取近百万元，在不出台新调控政策的前提下，需求旺盛，预期睇升，新盘增加的额外费用也很快被买楼者消化。

究竟内地楼价会升到甚么程度，各人看法不同。不过，易居中国总裁丁祖昱指，因各城市房地产存量水平持续减少，不能跟上持续释放的市场需求，估计短期内楼价会持续上涨；但房产供不应求态势在四季度及明年会逐步改观，从而放缓明年房价的上升势头。

对于中长期国内房地产市场形势，他认为，人口红利期结束将使未来房地产市场需求总规模逐渐减少，未来五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将进入平稳期，之后可能出现局部调整。

土地税收体制成改革重点

对于炽热的楼市，管理层似乎没有大动作，不像以往一再出台调控措施来遏抑楼价。有分析认为，李克强一向强调改革应着眼于“顶层设计”，即是不再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火形式来整顿市场，而是从体制上着力，根本性的去解决问题。

分析认为，三中全会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改革力度之大将前所未见，其中包括金融自由化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税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而涉及房地产领域的包括土地制度改革、房产税改革、地方税收改革等，这些改革都是要相互配合才能成功，这正是为何中央暂时对楼市按兵不动的主要原因。

据了解，针对房地产市场，土地制度改革将是重头戏。目前由政府主导的土地征管交易方式，是造成十年楼市调控无果，房价愈调愈高的重要原因。估计未来要取消各级政府的土地储备制度，国有土地、集体土地都作为市场主体直接入市交易，土地制度改革是房地产调控的釜底抽薪之举，是遏制高房价的治本之策。

更重要的是，这将改变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令房地产市场绑架经济的畸形现象。当然，要将土地出让这块肥肉从地方政府手中拿过来，必然会遇到很多阻力，绝对不容易，这要考验中央改革决心与能量。

征收房产税限购政策退出

其次，业界估计税收将在房地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房地产调控手段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双双提到“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因此，三中全会后征收房产税是必然之举，至于到时如何征收将会明朗化。

虽然，有不少言论指征收房产税对遏抑楼市作用有限，过重的征税又会引来民众强烈反弹。不过，征收房产税的作用并非要即时压低楼价，重点在形成长效机制，将行政手段色彩较浓的限购政策等退出。

再者，三中全会将形成新的基本住房制度体系，即：按照“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的框架思路，商品房市场主要以市场调解为主，主要是中高收入者的市场；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由政府提供帮助。政府将会把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作为长期工作抓紧抓好。

当然，这些改革涉及不少人的既得利益，阻力必大，有多少可得到落实，将成改革成功与否的指标。

外媒：三中全会关键在于给出清晰的改革基本原则

台湾《财讯快报季刊》指出，随着中国大陆经济数据的好转，坚持经济结构转型的新一代领导人，描绘的经济发展轮廓逐渐清晰。中国大陆即将展现习李接班后的经济增长型态。而即将于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是可以看清楚中国新济政策全貌的最佳时机。

文章说，如今，在三中全会召开前，重大的经济政策陆续面世，且政策颇有一新耳目之感。再者，对照去年习李确定接班之后，一路以来禁奢肃贪。这样的贯彻行动，让人对于习李的政策执行力有高度认同感，因此接下来中国大陆成长重心落在何处，就看十八届三中全会。

台湾《经济日报》社论指出，近几个月来，习近平、李克强等大陆领导人频频在媒体前曝光，以实际行动向内外昭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

文章说，转变政府职能涉及行政体制，行政改革的核心内容在简政放权，目的是要减少各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也就是要减少行政审批，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财政体制可能是新一轮改革的另一重点领域。财政改革的目标，在于平衡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新一轮金融改革的目标，主要是在消除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扭曲，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金融系统风险，利率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是关键方向；加快民营金融机构发展将有助于打破银行垄断，增加市场竞争；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助于活络存量资金，降低金融风险，都将是改革的重点。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指出，中国 1994 年启动的旨在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分税制”改革使中央占据了大部分税收，并通过财政转移和补贴的方式将部分资金让渡给省和地方政府。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在下个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财政体制改革将是议题之一。

台湾《财讯快报季刊》指出，十八大三中全会几乎已确定会定调在“改革”，七大领域包括行政、财税、金融、价格、土地、户籍、国企，以及高龄化社会要面临的教育文化资源重分配、推动就业增加收入、社保改革、健康改革等。这些改革伴随而来的商机，就是未来投资中国大陆的关键指标。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指出，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信心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习李

在经济政策都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2)、拥有足够的力量推行艰难的变革。(3)、全会议程经过广泛的思考及调查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库起到重要作用。(4)、改革者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全会文件关键词受期待

香港《文汇报》指出，今年以来，中共高层多次要求各级干部要树立“底线思维”，就是凡事要往最好的方向努力，但要做最坏的打算。在改革问题上，行事之前划出底线，这一点毫不含糊。在明确底线的前提下，习近平表示，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

文章说，“胆子”是战略层面的问题，“步子”是战术层面的问题。战略上要有大视野、大格局，中国即将出台的改革方案，不是“单兵突击”，而是统筹推进，囊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必将对今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战术上要细致稳妥，中国的改革既注重“顶层设计”，也注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吸纳各阶层的意见，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小改革的成本和阵痛。

台湾《经济日报》指出，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改革方案毕竟只是一项纲领性文件，商机的实现系于改革方案能否贯彻落实。例如，攸关新型城镇化政策成败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与地方土地利益冲突，又如地方债务的削减，势必影响地方政府的投资规模，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中央财政支出或民间消费支出必须适时挺身而出弥补缺口。

然而，上述这些评论不会动摇大陆新一届政府推动改革的魄力与决心，改革是一项大工程，成败非一朝一夕。APEC 年会刚结束，看到习近平在大会期间纵横全场，信心满满；又看到李克强起身访问东南亚各国，改革开放加上领导人的执行力，应可期待。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指出，全会的关键在于给出清晰的改革的基本原则，以指导随后的政策细节并为其提供全方位理论支持。我们预期全会文件中的一或两个关键词将会被作为改革指导方针强调并广泛讨论。之前媒体报道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分析人士将仔细研究报告文件以评估市场在改革中能够获得多高的地位。这样一旦党的领导层提出观点，政府部门就能明白如何开展工作。

外媒：10 个你要知道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点

我们将列举出 10 点你需要知道的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及我们对 2013 年改革方案整体规划的预计。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新一轮改革方案意义重大，且随着未来数月方案细则的公布，新一轮改革方案将提振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

1.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经济政策蓝图

除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大会报告国家现状及党的议程以外，三中全会通常还会通过至少一项有关经济方面的重要文件。这一文件也可能涉及其它领域，同时三中全会有时也会通过政治、法律和民生方面的决议（但这些决议并不总是会公开发布）。这些文件的名称也许并不引人注目，如上一次三中全会（2008 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关于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正式准备工作开始于今年年初。准备工作涉及一系列复杂的起草程序，包含数百个机构递交背景资料、初稿以及审核意见。整个夏季，中国的高层领导们或许一直在翻阅并讨论这些关于经济问题的初稿。

2.这是一次党的会议，制定出党的文件

重大决议由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即中央委员会做出，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中央政治局，后者选举出政治局常委。七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重要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下属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全会经济文件的起草。涉及其他领域（如政治、法律等）全会文件的起草统筹由党内其他相应的高层机构负责。

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文件指引并形成其后的政府（国务院）政策决策和规划。因此，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于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战略完全认同并彼此协作至关重要。截至目前，充分的证据表明事实正是如此。

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官员也紧密参与到全会文件的准备工作中。各相关部委和官方机构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报告的准备工作，如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各部委提供决策建议。

3.某些三中全会影响深远

最常提及的一次三中全会是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次会议标志着改革的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通过很少具体的决议或改革细则，其重要意义通过其他方式体现出来。

1976 至 1977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最高领导层试图恢复中央计划经济以刺激经济增长。目标方案已经起草，投资计划已经设定，产量和价格单均已准备就绪。当时的重工业是命脉，涉及石油、钢铁及能源的约 120 个大型工程项目被选作引领经济复苏的先导。原本计划通过大幅增长石油出口而获得外汇收入用于支付进口所需的工程设备。然而，当 1978 年中国实际石油蕴藏状况变得清晰之后（石油储藏量远远少于预估），这项计划在 1978 年不了了之。当时 120 项投资计划预算投入为 120 亿美元，但 1978 年中国的总出口才仅仅 100 亿

美元。

在那一年，随后陈云也加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抓经济工作，并选择农业（而非工业）作为他的工作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农产品[3.04%资金研报]收购价格提高，人民公社悄然解散，家庭得以种植自己的土地并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具有争议的政策——允许农民自由耕种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未出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下面我们还将会提到这一点。

4.某些三中全会令人稍感失望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促生了真正的变革而令人弹冠相庆。2003年，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政当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聚焦于经济“扭转失衡”及推动农村发展。2003至2013年间，农村地区发展取得了重大改善，社会保障基础得以重建，全国各地都获得发展，真正的中产阶级逐渐形成。相反，21世纪初的中国发展仍由国企、城市住房建设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末的入世（WTO）改革所推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指出的许多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随后，中央政府于2008至2010年间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的实施时间过长加剧了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5.预期2013年的三中全会将宣告重大改变

2013年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趋向于上述两种先例中的哪一种？我们并不奢望它能够实现1978年那样的根本性转变，也相信它不会像2003年那样令人失望。我们的信心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1）、习和李在经济政策上彼此认同，都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2）、我们认为习在党内拥有足够的力量推行艰难的变革，这一点或许难以企及。

（3）、全会议程经过广泛的思考及调查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库起到重要作用。

（4）、改革者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如周小川（央行）、楼继伟（财政部）、刘鹤（国家发改委），这应会有助于减轻反对的声音，尽管部门内部可能还会有阻力。

（5）、地方政府或会赞成改革议程的某些方面，例如，很多省份眼馋新近宣布的上海自由贸易区政策。

6.期待全会提出大的原则，而非细节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并不是讨论诸如房产税征收水平、应当拨出多少资金用于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未来五年哪些国企应当被私有化等细枝末节的地方。上述这些细节可以放在筹备阶段讨论，同时国家各部委或许已有自己的计划（如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准）。全会的关键在于给出清晰的改革的基本原则，以指导随后的政策细节并

为其提供全方位理论支持。

没有颁布改革细节或许会让那些期待重大突破的人感到失望。然而与此相反，我们预期全会文件中的一或两个关键词将会被作为改革指导方针强调并广泛讨论。之前媒体报道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分析人士将仔细研究报告文件以评估市场在改革中能够获得多高的地位。这样一旦党的领导层提出观点，政府部门就能明白如何开展工作。

7.政府体制改革或许也会成为 2013 年全会的焦点

“给我一根杠杆和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阿基米德如是说。我们猜测李克强总理也认同这一点。从近期在北京与学界交流的情况看，我们认为 2012 至 2013 年改革派对改革战略的讨论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如何产生自我推动式改革——即政策改变能够为增长模式的其他改变创造动力。

我们相信这里的“杠杆”是政府体制改革。我们希望本次全会通过的文件能够有一章节涵盖如下题目：

精简政府机构。中国目前的五级行政体系中，每一级拥有自己的财政预算及人员编制。过去几年在 900 多个县镇推行的试点将这一体系由五级精简为三级（中央、省、县）。在这一领域，浙江省走在前列。精简政府裁减无用的重复职能部门并节省开支。中央或将逐步压缩市辖区和乡镇政府的预算自主权并逐渐推广至全国。一旦这些地方预算由中央其他政府部门管控，浪费性支出应会减少。我们注意到山东省正着手这方面的尝试。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自 2013 年 9 月起，山东省政府将允许县保留大部分新收缴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在此之前，全省所有税收都由省、市辖区和乡镇依据固定比率分享。该项政策意在加强当地政府的财权，提供资金用于当地公共服务支出，如教育、医疗卫生（目前基本由最低一级政府县级政府承担），然后逐渐降低对中间级政府的资金投入。山东省现由郭树清主政，其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中同周小川、楼继伟共事。

重新定位政府职能。正如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主政山东省时所倡导的，该项改革的核心在于扭转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局面。据报道，国务院已批准若干项取消行政审批及许可要求。随着审批权力的削减，腐败的机会自然下降。

为地方财政提供可持续来源。为保证县级政府能拥有资金用于提供公共服务，这或许需要允许地方获得税收（热议的房产税背后的考虑），同时割断他们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另外，很多学者提出将地方政府当前的部分事权上移中央财政，例如如果中央政府在初高中教育方面承担更多支出责任，将是十分有意义的。至少，中央政府应当增加对地方的资金拨付，鼓励地方将农民工纳入当地社保体系。

创建受约束的预算制度，确保资金支出的效率。中国的政府预算普遍不够细致。并且常常滞后，缺乏预算监督机制。当前对预算制度改革的一些好的建议包括：更为详实、透明的预算（想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先看下你的财政状况吧）；建立中期财政规划，这样一来当地政府不得不为未来负债建立预算；进行政府资产审计（我们对地方政府资产的了解程度甚至低于对地方政府负债的了解程度）；建立政府支出的独立评估体系；改进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体系。这一方面正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看来，官员绩效考核必须由看支出转向看结果，由看基建转向看政府服务质量。

清理当前及未来的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有望在未来三年正式推出，包括债务规模、还款来源、担保以及债务股本比等。相关数据将由财政部负责检验并监督。近期，中央政府官员明确公开表态，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清偿债务，不要指望中央出手相救。中央收紧地方融资平台信贷的举措看来已初显成效，已经触发了地方国有财产出售。

创造途径让私人部门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与其通过地方政府的表外工具开展基建，不如思考如何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到基建中来。这需要通过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签订明确的合同来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公开化。

上述措施背后的核心思路，是限制地方一级行政力量参与经济、精简公务人员数量、制约地方政府过度负债、推动更多资源用于民生支出。所有这些都将是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进一步转变。

8.国企改革仍是敏感话题，可能不会明确出现在今年的全会文件。

最近一次触发国有企业深层次改革的全会是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该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它为民营企业的成长打开了一扇门，小型国有企业被出售，大型国有企业经历整合、上市，变得更加强大。

我们认为国企改革将是一项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而不是能够在会议文件中描述或简单直面就可解决的难题。问题的思路在于要改变国企的经营环境，国企要么适者生存，要么被淘汰。诸如提高公共服务价格、打击产能过剩（通过让银行远离某些行业）、推动利率改革以及对私人资本开放铁路、医疗等行业以引入竞争等政策都将改变当前国企优越的经营环境。压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迫使地方政府出售国有资产。首批出售的酒店、商场及写字楼已然开始；我们预期第二波出售资产将涉及工业资产。将反腐调查拓展至更多行业（如医药、石油化工和电信等）或许将为更深层次的国企改革打开一扇门。为增强竞争力创造更大空间的举措（例如，通过中美双边贸易协定或上海的自由贸易区）同样推动着国企改革的进程。

本次全会可能的结果（也是改革者的目标）是国企改革将不动声色地由其他改革间接推

动。渐进式国企改革唯一的问题在于往往耗时过长，且结果无法预测。

9.总书记可能会在全会前夕赴地方考察调研，强调政策重点

2008年10月份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聚焦于农村土地改革。2008年9月份，胡锦涛总书记走访了安徽省小岗村，该村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全国首次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制度下农民得以有效地经营自己的土地）。胡锦涛告诉当地村民，它们的土地经营权将“长期不变”，但当前政府鼓励农地流转出租。当年10月份召开的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等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鼓励土地流转、商业化种植、农业集体化、城乡一体化，以及农民工纳入城镇户籍等。今年，有关允许交易出售农村“建设”用地（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房）的话题激起了热烈讨论。激进一些的观点主张允许这类土地出售或出租给房地产开发商或工业企业，所得土地出让款直接返还到农民手中。

习近平总书记似乎愿意到各地考察调研。我们期望今年10月三中全会前夕他会有一次赴地方的考察之行。2012年12月，他走访了深圳并明确地将此行与1992年改革前夕邓小平的著名的南方之行联系到一起。习近平在此次考察中表示：“中国的改革绝不止步，对外开放绝不止步”，他还表示，“我们应当敢于解决危险路上的困难与风险，敢于打破意识形态的分歧同既有利益对改革的阻挠所构成的屏障”。在习今年10月的考察之行中，人们将期待即将来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面临困难，会选择哪条道路，会拿哪些既得利益开刀。

10.改革已然开始

十八届三中全会至少有一点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类似，那就是关键的改革都已经开始。今年年初开始的反腐措施正取得显著成效，行政审批的权力正受到制约，一些价格正在放开（利率、天然气），在经济较长期低迷的形势下货币政策并未放松。我们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这些以初显眉目的改革趋势中扮演催化剂的作用，同时推动更多变革。（作者王志浩，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

●八面来风

李克强：中小企业代表生产力方向

10月25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工作。此次制度改革，通过促进小微企业，特别是创新企业更好更快发展，毫无疑问，再次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坚定转变政府职能的总体部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经验表明，改革就是要激发生产力，适应生产力发展。新兴生产力，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大批海归以及大学生创业企业，没有厂房、土地，没有多少固定资产，但这些企业有智力、有创造性，他们代表着新兴的生产力方向。怎么推动这么一批企业发展，是政府的责任。

近年来政府职能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缺位、越位与错位，给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本届政府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正是意图通过简政放权，使政府职能回归本位，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放宽公司注册资本登记门槛，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3 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10 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500 万元的限制都被一一打破。将极大地激活一批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发展活力，特别是代表新兴生产力发展的企业，带动创业就业，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让人民群众在深化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更多受益。

自 2009 年起，在中央的统筹部署下，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福建平潭、广东深圳珠海等地陆续开展公司注册登记制度改革试点，工商部门按照“宽进严管”的原则为企业办理注册登记，简化登记条件，提高登记注册效率，放松市场主体准入管制，使市场主体更加方便快捷地进入市场，最大限度地为投资主体松绑，释放投资创业活力，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据介绍，以深圳为例，今年 3 月 1 日实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以来，截至 9 月 30 日的 7 个月时间，新登记市场主体 24.2 万户，是去年同期新登记数量的 2.3 倍，全市累计实有市场主体 122.2 万户，民间投资创业的热情被大大激发。

当然，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绝不是只放不管，而是放要放的坚决，管要管的合理。因此，推行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关键，一定要按照便捷高效、规范统一、宽进严管的原则，强化市场主体责任，强化企业的自我管理、行业协会自律和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提高监管的水平和效能，让不合规企业“一处违规，处处受限”，共同为形成诚信、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而努力。（10 月 27 日新华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直言中国房地产泡沫严重



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中，罗伯特·席勒与中国关系密切，曾多次到访中国，并多次提及对中国房地产的看法，称中国房地产泡沫严重。

2009年12月罗伯特·席勒来到深圳出席某企业的活动，当时他在回答现场提问时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热，但是也有一些必须要警惕的现象，在深圳，房地产非常热，房价高居不下。”

席勒说，“在深圳、上海以及其他中国主要的城市，人们在买房，这样房子的价格实际上是数倍于他们的年收入的，不知道具体的比例是多少。我们在加州用电脑分析房价和收入比，看到的数字是8倍和10倍，我们就觉得太高了。如果是8倍，就要花8年的总收入买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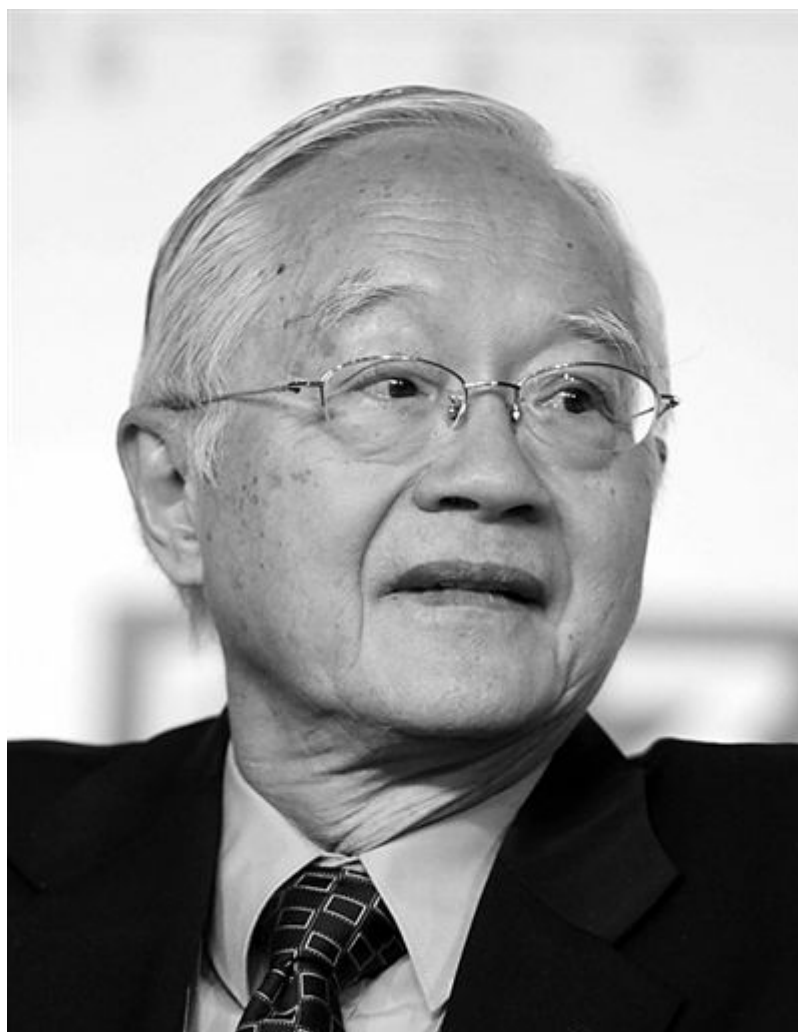
2009年，罗伯特·席勒到上海出席了由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举办的EMBA论坛，当时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上海的房价比较担忧。“早前听说过上海的房价，基本上是一个普通人一年收入的一百倍，也就是说，他要工作一百年才能用他的全部收入买一套房子。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还要买这个房子？答案是他预期房价还会上升。人是有投机心理的，他觉得以后房子肯定还会涨，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是非理性的。”罗伯特·席勒当时说。

2011年，在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年会(达沃斯论坛)上，席勒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再次谈

到房地产问题，并直言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

他说：“美国房价仍在下跌，我很担心它会跌到什么时候。家庭负债率仍然非常高，很多人失去自己的房屋，或因更换工作而转移到其他城市。与此同时，美国负债率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样人们担心，政府是否还有能力推出新的刺激政策。中国房地产现在泡沫严重，如果和美国一样泡沫破裂的话，这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打击。”（新京报 李媛）

吴敬琏批 4 万亿致鬼城频现投资驱动经济增长已到尽头



吴敬琏

6月下旬金融市场发生“钱荒”波动之后，网络上对货币当局对流动性的把握的评论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大多数经济学家们从长期进行分析，认为中央银行没有什么错。但是，也有许多网上的评论认为在出现了钱荒的时候，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在十多天的时间里不施加援

手，是政策上的失误。

在发生了短期性流动性短缺的时候，央行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出手，是可以讨论且应该总结的。但是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是长期问题。所以，如果仅仅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短期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可以靠央行“放水”渡过这一次危机，可是由于没有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随时还有可能爆发新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样有可能会放大危机，这就不是中央银行所能解决的了。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发生了问题。

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的提出已经很久。早在 1995 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国政府就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依靠投资的粗放发展到依靠效率提高的集约发展的“转型”。之后的五年计划和规划业都有提到，但始终没有解决，并变得越来越严重。

粗放增长在宏观经济层面造成的问题，是货币超发、债务积累，最后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和增长减速。由于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每次问题发生以后，采取的措施就回到老路子，用增加投资的老办法来拯救经济。于是，最近 5 年来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从最微观的层面看，就是我们的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现在维持人类生命的最主要的几个物质条件，包括空气、水和土壤都发生了问题。

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债务积累，企业、地方政府甚至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过高，以致常常出现或大或小范围内的偿债问题。而宏观经济每次出现这类问题，惯常的办法是采用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去动员资源海量地投入去救市。例如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2009 年用 4 万亿投资、10 万亿贷款，把 GDP 增长率拉到 8% 以上。当时有些人觉得非常得意，说我们率先走出了危机。实际上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它不但没有降低杠杆，相反进一步杠杆化了。

问题在于即使这种办法也愈来愈不灵了。4 万亿计划把经济拉起来，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经济增速就开始连续 5 个季度下降。去年 5 月以后，许多地方又通过政府融资平台，通过各种各样的表外业务、城投债，募集了巨额资金投进城镇化建设。例如西部地区某省的经济正在起飞，近几年每年的基本做法，是依靠作为“发动机”的政府和作为“助推器”的市场，用海量投资拉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这个省前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本地 GDP 的 94%，去年则是本地 GDP 的 114%。根据它的计划，今年的投资将是本地 GDP 的 120% 以上。

而一个沿海的地级市在去年第 3 季度提出“大干 100 天，大投资、大建设、大发展”的口号，组织了 18 个城投公司，融入巨额资金，进行大拆大建，希望以此来保持经济繁荣。采用这样的方式，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就变得愈来愈高。

这些投资中相当一部分是回报率很低、甚至没有回报的，还出现了一些所谓“死城”“鬼

城”。这样，罗伯特·索洛过去讲的投资回报递减的问题就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去年下半年的大规模投资，只是把第四季度 GDP 增长率拉起来 0.9 个百分点。到了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又下来了。所以，旧的增长模式和用强势政府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增长的发展路线已经走到了尽头。

另一方面，在杠杆率很高的情况之下，一有风吹草动，某种偶然的原因就会引发资产负债表的危机，也就是局部的资金链断裂传导到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引发系统性危机。现在网上议论得比较多的一种可能的危险，就是如果美元走强，热钱较大规模地流出，会不会发生像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0.00%]危机那样的问题？这使人很担心，只要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一个小火花就会引起严重的问题，而这类因为偶然的因素几乎是防不胜防的。

那么是不是危机就不能防止呢？当然不是这样。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根本的问题在体制，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

本世纪以来，改革先是放慢，后来在某些方面倒退。于是就出现了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宣扬。据“中国模式”的宣扬者说，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拥有一个威权主义政府，由强势政府而不是市场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支持高速增长。如果这种体制不改变，粗放的发展路线以及资产负债表的高负债率和高杠杆率都是很难改变的。

十八大确定要全面深化改革。现在中国正处在这么一个准备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机。大家期望，能够按照去年 11 月十八大和去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能够在今年的三中全会上，制定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不过我估计，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国民中，特别在官员中，存在的意见分歧还需要通过自由和切实的讨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讨论的结果和据以确定的路线图是不是正确，它的安排是否妥当，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性命攸关。(中国新闻周刊网作者：吴敬琏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天石：蒋经国“打虎”为何失败



一、蒋经国高调“打虎”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迅速加剧的巨大经济危机，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等几项法令和办法，宣布发行金圆券，实行限价，规定各地物价必需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上，不得提高，同时限期收兑民间所藏金银、外币。8月20日，行政院特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督导区。上海区以曾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助理，其任务是到上海实行“经济管制”。蒋经国虽名为助理，实际上负全责。9月9日，行政院颁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其用量不得超过三个月，否则以囤积论。

蒋经国深知在上海前台活动的商界大佬们的后台就是南京的党国要人，任务艰难，赴任之前，就对乃父说：“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作后盾，故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注1到上海后，蒋经国即在中央银行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调来1948年成立的国防部戡乱建国总队作为基本干部，以亲信王升（少将）指挥，企图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以铁腕手段实行经济管制，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行为。蒋经国声称，这是一种“社会性质的革命运动”，要“发动广大的民众来参加这伟大的工作”。注2戡建队宣称：将“以伸张正义的作法，严惩囤积居奇的奸商、污吏，稳定民生必需品的供应”，同时希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获得广大民众的

共鸣和支持”。注 38 月下旬，王升从戡建队员中选拔精明成员成立“经济管理工作队”，与新成立的经济警察大队联合办公，拥有检查仓库、货栈、账目，直接带走违纪人员，查抄货物等各种权力。8 月 29 日，成立“人民服务站”，设立检举箱，鼓励各界检举。其后，蒋经国先后扣押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及杜月笙之子、鸿兴证券号负责人杜维屏等“老虎”，转交法庭审理。

蒋介石支持蒋经国的铁腕做法。9 月 4 日，蒋介石召见上海市长吴国桢，吴担心蒋经国的做法有问题，蒋介石不以为然，日记称：“经儿将沪上最大纱商鸿元与杜月笙之子拿办，移交法庭，可谓雷厉风行，竭其全力以赴之。惟忌者亦必益甚，此为民之事，只有牺牲我父子，不能再有所顾忌，惟天父必能尽察也。”9 月 7 日，蒋经国亲自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对上海官商勾结的严重状况虽感到痛心，但对蒋经国的“战果”却听得眉开眼笑，“兴奋非常”。注 4 当日，蒋介石日记云：“经儿由上海来报告经济管制情形。往日所有黑市与囤积等弊多有我党政当局为首，言之痛心。但由此彻查，所有上海黑幕皆得发见，实堪欣幸。”11 日，蒋介石得悉上海“物价平稳，黑市几乎消灭”，认为蒋经国克服了经济上的“滔天大祸”，为“戡乱”奠定基业，高兴地感谢上帝的“保佑”，在日记中表示“不胜感祷之至”！注 514 日，蒋经国奉命再次回南京报告。蒋介石告以“食鼠之猫不威”的古训，要他“多做实事，少发议论”，以免他人指责。注 6 后来，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转告蒋介石，美国有人认为蒋经国在上海的作风，“全为俄共产主义之思想，而其行动真是打到大小资本家之力行者”，“美国人必强力反对，并将正式警告”，蒋介石得悉后，一笑置之。



由于满意蒋经国的工作，9月19日晚，蒋介石在和宋美龄乘车到南京东郊兜风时，特别和妻子相约，支持蒋经国在上海的举措，“同为经儿前途打算，使之有成而无败也”。

二、报纸报道的微妙变化

自9月12日起，戡建大队号召上海年满18岁至35岁的青年参加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与奸商、污吏斗争。报名者25428人，获批准者12339人。9月25日，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举行入队宣誓，蒋经国为监誓人，要求队员协助政府肃清上海的奸商。注9同日，蒋经国决定在上海实行物资总登记，限令各工厂及商家，于当月30日前将所存原料及制品向同业公会登记，报告社会局，逾期即在全市普查，凡未经登记的商品、原料，一概没收。

当时，上海最大的“老虎”是孔祥熙、宋霭龄的儿子孔令侃及其所开设的扬子建业公司（简称扬子公司）。9月29日，卢家湾警察局向上海警察总局报告，茂名南路、长乐路口的英商利公司汽车行囤有大量物资。经济警察大队会同该局前往检查，发现该处存有大量物资，均系扬子公司所有。另在大通路277号及虹桥路仓库中也发现该公司储存的大量物资。30日，奉命查封所有物资。10月2日，上海《正言报》发表消息，标题为：《豪门惊人囤积案，扬子公司仓库被封》，副标题有《新型汽车数近百辆，零件数百箱，西药、呢绒，价值连城，何来巨额外汇，有关当局查究中》、《货主孔令侃昨晚传已赴京》等。其中提到：“据该库及邻近住居者语记者，经警曾于前日至该库检查，并查封该项物资。后因为数过多，乃续于昨日完成查封手续。”

该报未说明消息来源，但据其中“该库及邻近住居者语记者”一语，可知该消息出自该报记者自身的采访。《正言报》创刊于1946年，创办者为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党部主任委员、社会局局长的吴绍澍。吴早年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思想进步，后因与军统和杜月笙矛盾，被撤销职务，创办《正言报》，批评国民党和政府。该报在上海各报中率先刊登扬子公司被查的消息，正是吴绍澍和国民党当局矛盾的体现。

同日《正言报》所发消息中，还根据接近孔令侃的扬子公司职员谈话，披露了公司被查封的后续情况：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曾致函蒋经国交涉，说明扬子公司营业额不大，查封之物，已向社会局登记，孔令侃并已于事发后乘夜车离沪赴京。

扬子公司的被查封，《正言报》和当时上海各报都未说明缘由，但是，根据当事人程义宽事后透露，这是杜月笙在儿子被捕后对蒋经国的“将军”。

程义宽隶属军统，时任经济检察大队长，每天都需要会见蒋经国，汇报情况。据他所说，蒋经国决定召集上海巨商开会，坚要杜月笙出席。杜在会上说：“我的小儿子囤积了6000多元的物资，违犯国家的规定，是我的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资登记交出，而且把他交给蒋先

生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的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我的身体有病，在这里不能多呆，叫我的儿子维屏留在这里听候处理。”杜月笙的话，合情合理，无懈可击，蒋经国不无尴尬地表示：“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在送走杜月笙之后，蒋经国立即派程义宽赴扬子公司执行。孔令侃不仅是孔祥熙、宋霭龄的大儿子，而且和宋美龄关系密切。宋由于早年小产，后来一直没有生育，非常疼爱她的这个外甥，视同己出，精心培植、呵护。杜月笙要求蒋经国去检查扬子公司，这就等于在他的嘴里硬塞了一块硬骨头。

继《正言报》之后，10月3日，上海三家大报《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陆续报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有关消息，但其态度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申报》的标题是《抄获扬子建业物资，呈候经管局候示》，不仅较《正言报》平淡，其内容则一是强调“上项物资均已向主管机关呈报有案”；二是强调外传相关报道不确，声称“至外传查获大批新汽车及呢绒等，则并非事实”。《新闻报》的报道根据上海警察局特别刑事处的官方文书，其内容大体与《申报》相仿，但其标题则为《扬子公司物资呈报当局有案》，说明该批查封物资“呈报”过，有案可查，意在告诉读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报道还称：“关于外传警局抄获大批汽车零件、呢绒等物，并非事实”。《大公报》的标题为《扬子建业公司查获一批囤货》，内容亦与《申报》、《新闻报》相近，完全未提查获汽车问题。

仅仅相隔一天，但三报与《正言报》的报道却相差很大。其故安在？

推其原，当和孔令侃的紧急赴宁与宋美龄的紧急上海之行有关。

据程义宽回忆，孔令侃在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天，曾飞往南京，向宋美龄求救。《正言报》的报道则说，孔令侃系乘夜车赴宁。两说在孔令侃赴宁所用交通工具上虽有不同，但9月30日确有南京之行则一致。注11另据中央社消息：宋美龄于10月1日晨9时乘美龄号专机抵沪。注12《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低调处理显然和孔令侃、宋美龄抵沪之间的紧急互动相关。

（待续）